

主编 金元浦

精神的世界

著

在难以抵达的彼岸，是痛苦还是使我们
这确实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我的

陈晓明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72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陈晓明 著

精神的边界

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陈晓明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金元浦主编)

ISBN 7-5351-2832-7

I. 移… II. 陈… III. 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488 号

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

© 陈 晓 明 著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科

地址 430015·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电话 8362558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地址 437600·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9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4 千字

ISBN 7—5351—2832—7/H·107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印刷厂调换

陈晓明1959年2月生，福建人。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社会任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与思潮、后现代文化理论等。主要著作有：《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本文的审美结构》（1993）、《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1994）、《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1997）、《仿真的年代》（1999）《陈晓明小说时评》（2000）、《无望的叛逆—从现代主义到后结构主义》（2000）、《后现代的间隙》（2000）等。发表论文评论近二百篇，近二百万字。并在欧美学术刊物“Critical Stukies”、“Borndary2”等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主编编选丛书文丛多种。



总 序

金元浦

大化流行，阴阳衍变。我们正跨进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文化的世纪。

奇思穿云，文涛裂岸。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的创造的世纪。

大化弄人。当我们历尽艰苦厘定文学的审美内涵、文本核心、语言本体的时候，文学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迫不及待地跨越边界、扩展容量，并迅速转化。

文学以一种不容分说的姿态走向了文化。

文学批评因而也不由分说地进入文化批评。

短短二三十年，文化的媒体发生了多次革命性变革。从纸媒质革命、无线广播媒质革命、电视媒质革命，直到今天的多媒体互联网革命，文学与其

他文化类型的联通和融合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与电视（电视剧、电视小品、电视散文）、文学与电影、文学与通俗歌曲、文学与互联网艺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文学与传播、文学与科技、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流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学在萎缩，文学在沉迷……

文学又在扩张，文学又在疯狂……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有人欢呼雀跃，欣然迎纳，视之为新世纪的福音。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也有人忧心如焚，极力排斥，视之为妖孽鬼魅。

然而，不管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巨变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 20 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与这一阶段的人类最重大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

但在理论研究领域，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却一直被正统文艺学或文化学特别是传统的学院研究放逐在理论的边缘，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低俗文艺形式，不具备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囿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原有的学科界限，固守文学种类与体裁的藩篱，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当代文学在实践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边界，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艺/文化方式推进。它与其他文艺形式和现代传媒结合，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文类与体裁，也借助现代高科技，创造出了新的更为普遍的传播方式。同时，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实际上已占据当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代批评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

大化造势。如果说中国 20 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伟大的文化革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

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文化的电子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借助媒介，文化的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效率更高。

涛头潮鸣，大化难违。

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当代文化。

今天的电子技术不仅为其使用者赋予了一个可以操作的空间，而且赋予了一个能够创造意义的空间，一个有着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而有待填补有待扩展的空间，电子媒介不仅是意义的传送者，同时，它还是意义本身，它创造意义。媒介介入了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媒介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或“超真实”。

无疑，当代西方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系，也是中国当代学术与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西方与中国，构成了当代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张力结构。在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所面对的问题、现状和视野与西方相当不同，因此，特定历史语境在这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定历史语境提

供了现有论题的问题域。它给出了问题的指向性，给出所设计、投射或筹划的问题的解决的趋势或方式。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迈向文化研究的进程只能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和展开，当然这一语境中包含着开放的当代世界背景。

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六洲歌头”取自宋词的词牌，原名是“六州歌头”，现改一字以求与此变化的世界相谐。歌头者，引子也，嘱意抛砖引玉，以期我国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鸿篇巨制。

“六洲歌头”愿为新世纪文化的辉煌交响奏响序曲。

“六洲歌头”期待着我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黄钟大吕。

应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约请，我邀集朋辈师兄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陶东风、周宁、周宪、程光炜共襄此举，编辑了这套“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后东风兄因时间不及而退出。这些学者都是文学—文化批评界富有影响的青年导师，学界才俊。他们文思敏捷，勇于探索，妙笔挥洒，新见迭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粹的学术成果。在此我对诸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对本套丛书责任编辑漆咏德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是他三次北上，运筹帷幄，也是他辛苦劳顿，编辑修改，终于使此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谨为序。

2000年3月于北京海淀塔院姑妄斋

序

自序

多元文化(pluralistic culture)或文化的多元化,是近年来国内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术语。其背景既有当下文化现实的诉求,也有西方思潮的影响。后者的成分明显重些。这个术语在西方的高频率使用,反映了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思潮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个术语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特别是晚近时兴的文化研究尤其把多元文化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加以发挥,或者说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态度和立场贯穿于人们的理论视野。80年代以后,有谁还坚持一元论的威权文化?稍微有点理智的人,不可能在公共领域听到有谁自诩惟我独尊的独断论观点。但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口头言称是一回事,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思想意识可能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否真正呈现为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还很难说,人们是否真正信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也不尽然。如果认识与实践没有差距,那就不存在种族歧视,也就不存在对弱势/边缘群体歧视的问题;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斗

争发生。

确实,没有理由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完全信奉了文化多元化的观念,但多元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进入9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历史进入另一种格局——被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描述为后冷战的“新秩序”时代。尽管这种说法很难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认同,但冷战设定的东西方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状态,使与之相关的二元论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也随之瓦解。冷战的结束终究以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美籍日本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后来汇编成书,出版于1991年),在福山看来,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已经明了,那就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观念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福山道出了西方思想界的一种普遍看法,但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例如,一批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对此就持批判质疑态度。像德里达这样一度掩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面目的思想家,也愤然驳斥福山观点。其驳斥方法有论有据,思想全面且深厚。但简要概括而言,主要是就西方殖民主义时代对第三世界压迫,以及当今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展开论述,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历史所掩盖的另一面实质。西方过去的历史不光彩,历史也远远没有结束。

后冷战时代并没有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

在欧美大学校园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缘由在于大学墙院内的左派势力重新抬头。七八十年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年代,与此同时,右派保守主义势力也在大学执牛耳。但冷战结束并没有使右派保守势力昌盛,却引发了左派抬头,也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很显然,左派抓住了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个时代趋势,从侧面包抄。大力倡导文化多元论,强调可选择性(alternative),批判全球化推行的新霸权,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诊断。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使左派激进势力处于退守境地,现在,作为边缘的左派正好向中心进攻。90年代,美国大学时兴PC运动(political correct,政治上正确),多元文化显然是其主导内容,种族问题,少数群体的权益问题,这些都在多元文化的框架内显出其重要性。也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学人文学科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而后结构主义反中心、反主流价值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后结构主义的跨学科特性,使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起文化研究这种超级学科,成为大学里的显学。这使左派思想与教育课程紧合,重新夺回了大学思想阵地。

后结构主义并没有像反对者预言的那样,在80年代后期就日渐式微,当时跃跃欲试要取而代之的新历史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门派,不久就发现,在他们锋芒毕露的思想底下,隐含着深厚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正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重获生机。而在90年代成为显学的文化

研究,正是广泛综合运用后结构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而显示旺盛阐释能力。文化研究关注的主题,如媒体的霸权特征,传媒一体化的压迫与重新建构主体的可能性,性别与文化身份,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选择等等。这些主题无不与多元文化有关。如果说具有左派色彩的文化研究还有什么主导思想的话,那么,反中心反霸权则是其主要的思想。这显然就是文化多元论的立场。

多元文化观念突显为当代的重要论题,这显然与全球化加剧有关。90年代,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情势加剧,建构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这显然需要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思维与策略,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国际新秩序建构。一方面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具有领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号称高度民主化的国际新秩序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也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这种选择的实质依然是少数政治权威人物的选择,但民主化的国际格局中,无疑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余地。政治上的可选择性,经常是以文化传统的不同为依据。政治具有可比性,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一目了然;但文化之久远深厚,神秘不可知,让人捉摸不透。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以谋求保持自身的“特性”参与全球化,多元文化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选择披上了堂皇的外衣。

对于全球化的经济管理来说,它也不得不参照多重文化的价值对话。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当地

化(localization),这不只是关涉到大规模使用发展中国家
的廉价劳动力,同时还有本地市场,以及税制方面的优惠和逃税的便利。这使那些第三世界文化的特殊性方面受到关注,文化的多元性价值参照同样渗透进全球性的制度规划方面。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的价值受到推崇,但全球化的不同部门利益的争端,也使多元文化价值不容忽视。正如马丁·奥尔布劳在论述到“全球性管理”时所说的那样:“没有一种权威能够平息争论,也没有一种主导性原则能够成为全球性制度的依据。”全球化并没有实现价值一体化,但多元性价值终归是在全球性制度体系重新规划它们的结构与意义指向。马丁·奥尔布劳同时指出:“它们的多元性并未反映关于全世界共同利益的理论,而仅仅反映了民族国家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历史增长和相互影响,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必须相互妥协。……全球性并没有解决价值冲突问题,而是在人们以前只关心技术问题引起一场关于价值本身的争论,这场争论后来也波及制度的最高层次。即使从这种理由看,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也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原料。”

由此可见,全球化导致的悖论在于,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某种一体化,但同时也培育了多元化的可能。但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单位可以平行和谐相处,共同分享全球化的经济成就及精神价值,它也有可能酝酿分离化的倾向。这就是说,全球化在某些人看来,使人类进入到一个大同的至福时代;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包含着更深分裂的隐患。这种观点不只是来自激进的左派人士,而且倾向于保守的人士有着更为极端的看法。1992年,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萨谬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亨廷顿早年在对民主和专制社会起源的研究中认为,现代化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混乱;现在,他又试图论证,全球化导致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和冲突。亨廷顿明确指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他把全球格局设定为几个大的文明实体单位,他认为:“不同的文明的人们之间的互动作用提高了人们的文明意识,这一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正在扩展或有可能深深地延伸到历史上的各种分歧和仇恨。”他所理解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它并未创造统一,反而导致沿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产生的新的断片。亨廷顿的推论出乎通常的观点,在他看来,全球化趋势下构造的世界新秩序并未使西方的影响处于强势,相反,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亚洲文明正在扩张,伊斯兰世界自行其是,全球化或现代性并未有效使非西方文明转化为另一种文明(西方文明)。总之,非西方世界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民族/国家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来划分自己的归属。其最终结果,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